

(美) 罗伯特 A·柯白 著
殷钟嵘 李惟健 译

四川军阀 与 国民政府

四川人民出版社

〔美〕罗伯特A·柯白 著

殷钟嵘 李惟健 译

四川军阀与 国民政府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成都

责任编辑：蒲其元

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6.375 插页5 字数144.8千

1985年12月第一版

1985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50 册

书号：11118·215

定价：1.50 元

中译本前言

我这部篇幅并不很长的著作，现在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本，对此我深感荣幸。我深深感谢出版社的负责人决定出版这本著作，我也非常感谢本书的译者，我还要特别感谢武汉大学历史系肖致治先生给我的帮助。自从1977年初在武汉会见肖先生之后，我们之间一直保持着友好情谊和联系。肖先生为本书中文本的出版而大力推荐，其盛情厚意使我感激不已。

对读者来说，这本书是在另一个国家里写的。我认为如果要使读者对本书能有全面的了解并作出恰当的评价，则应使他们了解本书的产生情况和写作环境。因此，我请求把这篇短短的前言收进本书中译本中。

美国学者一般把我写的这类书叫做专题著作，即对一个范围相当狭窄的题目所进行的研究。它不是一本理论著述，而是我们可以称之为对民国时期的地方黥武主义或军阀主义的“实例研究”。它也是对这个时期的中央政府如何对待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富饶省份的军阀的“实例研究”。

在过去三十年中，美国学者对近代中国的研究领域大大扩展了。在美国各大学和学院任教的数百学者，对清代中期以来的中国历史进行了研究，其中大部分学者都是在写作他们的博士论文时才开始对中国历史进行广泛研究的。后来很多学者把自己的博

士论文出版成书。这类书籍大多由附属于大学的出版社，即所谓的“大学出版社”出版，它们以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同行专家为其读者，几乎都不面向非专家的一般读者。它们的目的是为了影响民众对历史或当代问题的看法，当然更不是（象我国一些书籍那样）为了广泛发行以便为作者或出版人大量赚钱。与之相反，象我以及其他学者所写的这类历史专著，具有双重的目的。一方面，历史学家把他的研究和著述集中于一个范围狭小的题目上，力图为众多学者所不断建造的认识大厦增添一小块知识之砖。换句话说，专题作者希望他的研究能够为日益进展的研究工作增添有益的东西，也就是使之成为继续不断的、永无终止的历史论述的一个部分，而这种论述却又构成他所从事的历史研究的“长河”。另一方面，许多专著特别是由那些年轻学者的博士论文改写而成的初次问世的书籍，乃是为了谋求在大学任职和晋升而写的。研究工作以及作为研究成果所出版的书籍，在美国学界是晋升所必需的条件。出版物被广泛地认为是衡量一个学者能否在大学中担任职务和取得更高学术职位的最重要标准。

我愿向本书的中国读者指出，大部分论述近代中国的专著所抱上述两个目的是有具体含义的。一方面，我们历史研究的学术领域中的那些专著，在处理范围广泛的解释性问题时，或在发挥某些具有深远意义的论点而这些论点的重要性已大大超出狭窄的研究题目本身时，通常都会遇到困难。优秀的历史著作都体现了作者对历史的探索或一种创造性的评述，但很多很多的专著，包括本书在内，都未能做到这一点。（对于象社会学、经济学或政治学这些“比较纯粹的”社会科学来说，情况并非完全这样。这类学科的学者在开始研究时头脑中已经有了基于广泛理论设想的一些理论模式或假设。但另一方面，这类研究工作中的问题往往在

于研究者不能利用具体的资料来有效地检验其理论，也就是说，习惯于使经验材料去适合头脑中的先入之见，而这些先入之见乃是作为研究基础的某种理论所强加的。）

另一方面，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采用专题著述涉及大部分这类研究方案的职业背景。我认为，中国或别的外国读者应该对这一背景有所了解。为什么历史专著都要采用这同一形式呢？有如下几个理由：第一，掌握汉语（白话和文言）的巨大困难影响到研究题目的选择和研究方式。目前虽然有成百的受过极好训练的美国学者能够运用中国古代和现代的历史文献，但是几乎谁也不会认为学习汉语的困难同学习采用字母的西方语言如德语和法语的困难可以相提并论。掌握汉语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当目前这批年纪较轻、学术地位仅属中等的中国历史研究者之中的许多人还在被培养时期，普遍情况是，年轻学者都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开始研究生专业学习的时候才着手研究汉语。中学里几乎从未开设过汉语课，美国的大专学校开设汉语课的也为数甚少。因此，一个年轻学者的汉语训练是在他开始上中国研究方面的课程时才开始的。在研究工作完成和论文写好之前不可能获得博士学位。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课程有的需要十五年，而需要十年则是十分平常的。显然，一个还在学习运用中国历史资料的学生，如果想要避免花费半生之久的时间以取得博士学位（也即是他在职业上的资格），他就必须选择一个没有太大语言文字障碍的题目。此外，在选择我们称之为“可驾驶的”题目时，年轻学者还必须考虑从图书馆、档案、甚至私人访问中可以取来用于研究的大量历史资料。如果一篇论文（即日后出版的书籍）需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完成，而学者本人也因而得以谋生并从事专门职业的话，那么他就必须选择这样一个题目，即所

需资料不致于多得把他掩埋起来。不难理解，这种作法将导致学人竞相选择那些内容高度集中、范围一般很窄的题目去进行研究。而这样产生的论文和书籍，十之八九都只能是一种技巧练习，只能是作者运用艰深的汉语历史资料的能力证明。在我看来，专题著述的这种传统，由于倾向于这类的能力证明，势必削弱论述的创造性。总之，专题著述的这种传统起了使学者谋得专门职业的作用，却往往无助于发展学术的目的。我认为，这是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领域中一个严重问题。这个问题比上面谈到的语言文字上的困难问题更为广泛地存在着，但伴随研究中国历史而出现的语文难题，正如我在上面提到的那样，给这个问题增添了一种特殊的因素。译成汉语的这本专题著作，也同样受到许多这类问题的不利影响。

我必须谈谈在写作这类专题著述时出现的另一个因素。我们是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开始进入这一研究领域的，对于我们这批中国学专家来说，当时要想在中国大陆待上一段时间以从事学术研究或体验中国的社会生活，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中国似乎是抽象的，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当时我们可以长期在台湾学习语言，研究历史，而且经常得到那里的学者的热情帮助。这种经历是非常宝贵的。但是，由于不可能在中国大陆进行研究，我相信，我们许多研究工作的性质和质量受到了影响。这种情况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明显起来。不过我并不认为，目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历史研究的更多的机会，将自然而然地使研究者在每个问题上都能获得有利的结果。例如，面临汗牛充栋的历史文件，甚至最勇敢的学者也可能不得不选择越来越狭窄的研究题目，否则就不能胜任，这是很不幸的。但是在写一篇关于中国某地或某省的现代历史时，如果作者连该地或该省都没

有到过，没有同那里的居民谈过话，没有吃过那里的食物，也没有游历过那片土地，这本身就是很矛盾的。中国读者只要读一下本书，或许就会知道，作者在写作本书前从未目睹过四川。作者本人在进行这项研究工作的时候，已经非常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

我希望这些议论将使读者对本书是如何产生和为什么要采取目前的形式能有所理解。假如我现在重写本书的话，我就会以较前大得多的注意力来重视我所研究的这段时间中的四川社会史和经济史，例如，作物、气候、农村的经济结构、城市中技术和社会的变化以及地区之间的差别，如成都平原与省内长江流域一带之间的差别，桐油和鸦片产地与各粮食作物中心产地之间的差别。撇开省界不谈，象四川东北边境县份（通江、巴中、万源、城口等）的社会和经济历史与处于中心地带的红色盆地县份的社会和经济历史，可能就大不相同。我现在觉得这些题目都是应当加以论述的，但本书并未涉及。还有一个题目，即四川军阀间的错综复杂的私人关系，我本拟比较深入地加以探讨，但我只在论述辛亥革命之后兴起的学系的章节里略略谈了一下。最后，我给予哥老会的注意也很不够，因为大多数观察家，无论是中国的或外国的，都认为它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中起主要作用的社会势力。我在另一项研究中探索了这一重要问题。但是，由于这个社会集团极为秘密的性质和缺乏文献，在研究的道路上当然是充满了障碍的。

最后让我再说几句更加积极的话来结束这篇前言。我把一生中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都花在对四川的思考和研究上。即使现在当我已不在高等学校任职而在美中交流和贸易领域里工作的时候，我依然从学术角度出发对这个河山壮丽而饶有兴味的省份感

到兴趣。这些年来，我对四川的文化、政治和社会历史已经有了一个粗浅的认识。我同台湾和大陆的一些川籍人结为朋友，他们丰富了我的生活。当我终于在1980年夏天首次来到四川的时候，我感觉到，我毕生的事业正在得到实现。我希望而且相信，我对四川历史的研究工作将会继续下去；在美中关系正常化了的这个美好的年代里，是有可能学得更多关于四川的知识。我希望，本书的出版将会有助于促进我和同事同我们的四川朋友之间的学术关系和其他关系的发展。因此，当我有机会把本书提交中国读者讨论和指正的时候，我是特别感激的。

柯 白

一九八二年八月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地方政治的演变	(7)
第二章 四川的统治者	(27)
第三章 1927年后的四川军阀与本省社会	(40)
第四章 四川与中央	(76)
第五章 现状的崩溃	(107)
第六章 国民政府与川省改革	(122)
第七章 争夺省的最高权力	(148)
第八章 一个时代结束了吗	(167)
参考文献	(174)

引 言

本书是对中国一个省内的黷武主义和分裂主义的研究，也是研究那些在政治上谋求中央集权的人在几十年的动乱和分裂之后，力图将该省统一到全国政治结构中去所作的种种努力。这个省就是四川，它位于长江上游，地区辽阔，出产丰富，人口众多。本书涉及的时间主要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整个三十年代。

这一研究课题的重要意义实际上是双重的。在民国时期，四川省的黷武主义，一方面是时代的病症，它体现了清朝灭亡后的特殊情况；另一方面，四川省的分裂主义也体现了帝制中国早已有之的政治倾向与困难局面。诚然，政治统一与分裂倾向之间的冲突，是自古而然的，它是公元前三世纪中国的封建割据被秦代统一以来中国历史的特点。

从更近的情况看，二十世纪的黷武主义和地方分裂主义是在这样一个黑暗时期出现的。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古老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土崩瓦解造成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四分五裂。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当1912年帝制政府消失时，并没有任何现成的方案或成熟的政治结构与思想体系可供中国采用。二十世纪人们目睹了帝制中国逐步转为民国的痛苦过程，也目睹了传统与革新的冲突，以及历次试验的失败。早在十九世纪，一些根本问题已经逐渐表面化了：中国怎样抵御贪婪的西方国家以保卫自己？中国是

一个“国家”吗？它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国家？怎样才能组织和管理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政府？尤其重要的是，这样一个政府怎样才能取得合法的地位？应该怎样对待它的广大民众？要知道这些民众历来只是在很窄的生活领域内同正统政府有所接触，而且政治觉悟尚处于未萌芽状态。由于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的可行办法姗姗来迟，帝制崩溃后的中国经历了长期的动乱与分裂。

为建立一个真正的全国政府的努力不断遭到失败，中国瓦解成为无数独立地区并分别受制于个别军人或军人派系，这就是民国时期的不幸局面。二十世纪的地方黥武主义，也就是通常称作的“军阀主义”，是在政局难于逆料，社会动荡不安的土壤上滋生起来的。试图以西方的立宪政体代替帝制的努力从一开始就失败了，而阴魂不散但又缺乏基础的帝制复辟梦也在1916—1917年遭到粉碎。因此，民国时期的黥武主义在二十世纪中的特点是，缺乏公认可以取代割据的途径，不懂得地方黥武主义是一种背离正道的制度。

然而，不能把民国时期的黥武主义仅仅看成是帝制崩溃的结果，它也是地方分化与地方自治这一古老问题的新表现。强烈反对中央集权制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幅员辽阔，气候悬殊与地形复杂，在于旧中国交通阻塞，以及其他不同的因素使各地区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

此外，有限的地方自治在中国帝制政府的政治准则中曾经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由一小撮官僚掌握的中央政权是否具有效率与活力，取决于形式上的政府是否把对地方事务的干预缩小到最低限度。这是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保持一种适当平衡的办法。如果搞过了头，地方各自为政的局面就会威胁中央权力的存在。在一个区域或一个省之内无法征收税款或不能维持治安都是

帝国软弱的征兆和日趋衰微的原因。一旦正統的中央权力与顽强的地方主义之间的微妙而和谐的平衡遭到严重破坏，中央权力也就无法行使了。政治行政中心一旦崩溃，地方分裂主义随之增强，就会使中国政治组织的重新统一更加费力。

诚然，帝制取消后遍及中国的一切黥武主义，并不都是在以这种历史和地理为背景的地方主义中产生的，但其中不少确是如此。民国时代许多军人的幸存或覆灭也取决于同样的因素，这些因素形成了各个地区特有的意识的基础。1911年以后，边界自来决定于地理因素的一些政治单位，比起帝制时期来更为明显地从更大的政治单位脱离出来了。此外，复苏了的地方主义并不局限于某一级的行政机构。中国在辛亥革命后并没有分解为独立程度相同的许多省分，也没有变成自足程度相同的许多县区，更没有分解为同样自行其是的大小乡镇。特别强大顽固而引人注目的地方主义表现在省这一级。尽管制度化的行政程序随着清代的灭亡而崩溃，但作为一个政治单元的省在整个民国时代一直保持下来。在所谓军阀时期，个别省分如广西、广东、山西、云南和四川是为军事首领们长期提供给养的基地，转过来他们最为关切的是保持省的权力。

处于中国西部的四川省正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从1912年直到国民政府宣告迁都重庆的1937年这段时期的大大部分时间里，外部权力和军事力量对整个四川省鞭长莫及。三十年代中期，中央政府力图把四川纳入摇摇欲坠的全国政治结构，这表明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统一全国的方式，同时也暴露出中央集权者必须克服的许多障碍。

四川物产丰富，人口众多。位于该省中部，以人口稠密和土壤颜色著称的红盆地，由于许多天然障碍而与世隔绝。在沿陕

西、湖北的北部边界上，大巴山脉形成了一堵墙，只有沿着几条古代的羊肠小道才能通向省外的渭水流域和华北平原。在四川东部同湖北和湖南毗连的地区也是山岭绵绵。虽然长江是四川同外界联系的主要通道，沿江而下可以到达华中与华东，但是必须通过有许多急流险滩的长江三峡，旅途不仅旷日持久，而且易遭阻滞。与贵州、云南接壤的南部边界更是崇山峻岭。在西部与西北部，与四川接壤的是西康、青海和甘肃的荒凉贫瘠而人烟稀少的高原和大山。

因此从地理上看，四川是一个独据一方的王国，一旦中央集权政府谋求统一的机能失去作用，四川便很容易切断来自外部的控制。本省在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也有助于它保持隔绝状态。公元前三世纪，中国的这块地区就以富饶多产著称；从公元后三世纪起它就号称“天府之国”。⁽¹⁾不但成都平原的庄稼一年二熟，盆地中丘陵地区精耕细作的农业也欣欣向荣。传统上四川总是以多余的谷物供应比较贫瘠的省分，它素来盛产糖和丝，许多地方还产盐，位于西南的自流井就是产盐区之一。在十九世纪期间，四川成了中国栽种鸦片的主要地区之一。在二十世纪，它以巨大的生产力供养着大量人口；三十年代中期人口已接近五千万。⁽²⁾

从三国时代刘备与诸葛亮在此建立蜀国起，直到明末张献忠造反创立大西国止，四川一直显示出同中国其余地区的政治活动脱离的倾向。中央统治一旦削弱，分裂主义的四川首领便在本地建立政权这种例子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然而从四川拥有的文化财富来看，四川毫无疑问是中国整体的一部分。一次又一次的移民与开发浪潮，象明末四川人口锐减时他省人口移入四川那样，有助于增强它与国内中部地区的文化联系。

中国的佛教圣地峨眉山，公元前三世纪由李冰修建的位于成

都平原的宏伟水利工程，以及自流井的巨型产盐联合企业，都是四川最闻名的财富。在自流井，可以从几千英尺深的井里引出天然气来，用于熬盐。木刻印刷也创始于四川，本省还诞生了一些最著名的文人。汉代词赋家司马相如、唐代诗人李白和宋代文学家苏东坡都是四川人。明、清时代，四川虽然远离北京政治中心，但仍然以优美的文化而声誉斐然。省会成都有“西部的北京”之称，以秀丽雅致而闻名。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Von Richthofen）于1870年访问四川时写道：

（成都）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也是最秀丽雅致的城市之一……街道宽阔，大多笔直，相互交叉成直角……所有茶铺、旅馆、商店、私人住宅的墙上都画有图画，其中许多幅的艺术笔触令人联想起日本的水墨画和水彩画……这种艺术情趣在周围郊区随处可见。而每一个小城镇在这方面都好像成都的再现。由红砂石建成的牌坊在乡间触目皆是，所有的旅游者无不为其精湛的艺术而感到惊异。牌坊上布满了以神话或日常生活为题材的浮雕，大都具有一种幽默感，其中一些不愧是中国的艺术杰作。这种优美在人民文雅的态度和高尚的举止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成都府的居民在这方面远远超过中国其他各地。（3）

四川之所以成为中国的一个省，其原因不仅在于它的种族成分和文化历史，而且在于它所具有的特殊性。特殊性本身又具有普遍性，这种乍看起来似乎矛盾的观点，正足以阐明一九一二年以后复苏了的地方主义和为统一而进行的长期斗争。四川方言、四川烹饪，以及星罗棋布的农舍，形成了十足的四川风光。它们既是该省的独特之处，但又确实是中国式的。在民国时代，四川同其他地区一样，虽然深受黷武主义之害和经济贫困之苦，但却

继续显示出它的风俗习惯与觉悟程度的独特性。因此，四川在“军阀时期”既不完全代表中国情况，也不是毫无典型意义。那些自命要统一四川或其他地方的人必须在下列两者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实行必不可少的国家一体化，同时对牵连甚广、程度各异的反中央集权的强大势力作出同样必不可少的承认。

在民国时代的中国，四川军事分裂主义的历史，就是四川军事首领们本身的历史。这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对于那些从时代的动乱和痛苦中崭露头角的英雄好汉来说，四川并不具有吸引力，而在中央与地方权力之间的斗争中，四川也无力提供令人满意的最后解决办法。四川并没有产生什么“模范长官”或“基督将军”，却出现了“冬瓜”、“瘟猪”、“两头蛇”、“听用”、“笑头和尚”；充其量也只能产生几个“常胜将军”而已。^{〔4〕}本书大部分篇幅将研究从1927到1937这十年，那是四川军人最强大和闹独立最甚的年分。这十年以1938年初那个四川省首屈一指的军人之死而告终，因为他去世的时间恰好与中央政府进入四川，以及四川与中央的关系作出改变的时间相符。

然而，中国最高政治领袖们的进入四川并未能消除当时地方主义问题，更不用说解决传统的地方主义反对全国政治统一这个更大的问题了。这种局面远在四川军事首领与中国国民党人出现之前早已存在，甚至直到这些人物中最后一个消失时还会继续下去。

【注释】

〔1〕陆宝千：《中国史地综论》（台北，1962年），第290页。

〔2〕伍德海（H·G·W·伍德黑德）：《中华年鉴，1936》（上海，1936年），第1页。

〔3〕李希霍芬（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李希霍芬男爵书简，1870—1872年》（上海，1873年），第129页。

〔4〕笔董（笔名）：《一百个人物》，第2期，第1页，未注明出版地点和日期。

第一章 地方政治的演变

(1911年~1926年)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的“军阀时代”，一般认为是从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开始的。袁氏重建帝制的失败为军阀称雄与地方割据大开方便之门，袁氏之死表明清朝灭亡之后中国已不再有一个确能维持某种程度的中央集权的人物。

“军阀时代”究竟有多长，意见不一。某些人认为，蒋介石于1928年击败北洋军阀，这就不言而喻地标志着军阀时代的结束。⁽¹⁾最近一篇研究某一中国军阀的文章曾经正确地指出，1928年后地方军阀主义依然存在，它是“残余的军阀主义”。⁽²⁾上述两种看法都是把北洋军阀实力人物段祺瑞、张作霖与吴佩孚所统治的时期看作是中国的军阀主义时期，它经历了开始出现，乱哄哄地兴盛起来，然后逐渐趋于消亡的几个阶段。

四川的地方军阀主义并不符合上述论断。1927年与1928年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统一”，决不表明四川军阀主义的消失，反而使四川的将领们一度变得比以往更为强大，更不受外界的干涉。1949年以后，标榜自治的地方军阀主义已经全部消失，如果按这一标准衡量，1927年后的四川军阀主义，可以算是“残余的”，但是当时并不能说它只是业已消逝的一个时代的残余物。

1927年后四川将领拥有强大力量与独立地位，是在民国时期的